

#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历史反思 ——以台湾省编译馆为例

杨彦杰

**摘要：**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 1945 年至 1949 年，台湾的文化重建以“二·二八事件”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陈仪主政时强力推动，设立了包括台湾省编译馆在内的各种文化机构和团体，并有一整套设想。魏道明抵台后，施政理念出现变化，文化重建的力度大不如前，台湾省编译馆即被撤销。总体上看，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并不彻底，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未被彻底清除，省籍矛盾依然存在，民族文化认同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巩固和深化。这些因素对后来台湾历史的演进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台湾光复初期；中华文化重建；台湾省编译馆

**作者简介：**杨彦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265.9；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5）06-0091-10

1945 年台湾光复以后，为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建中华文化，当时在台湾主政的陈仪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邀请其好友许寿裳赴台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工作，开启了台湾文化重建的进程。但很快“二·二八事件”发生，陈仪被迫下台，台湾省编译馆随后也遭到裁撤。有关许寿裳与台湾省编译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sup>[1]</sup>但台湾省编译馆被裁撤的背景及原因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台湾省编译馆为观察窗口，整体认识光复初期（1945—1949）台湾的文化重建工作，并总结其利弊得失。

## 一、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及其使命

台湾省编译馆是陈仪为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文化机构。1946 年 5 月 1 日，陈仪给许寿裳发了一封电报，内云：“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

[1] 参见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杨彦杰系列论文：《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82—194 页；《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的台湾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从民族抗战到民族文化重建：1945 年前后许寿裳对日本的认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7 期；《许寿裳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民族文化重建》，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历史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3—12 页。

来此主持。希电复。”<sup>[1]</sup>这是陈仪与许寿裳为设立编译馆而进行的第一次通讯联络。

由于陈仪的电文过于简略,许寿裳无法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因此希望陈仪能告知更多细节。1946年5月13日,陈仪给许寿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编译馆设立的目的、工作任务、隶属关系、待遇等。其中有关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目的,陈仪说: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需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

由上观之,设立编译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编印适于台湾人阅读的书报资料,以利于中华文化在台湾传播,让遭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中华文化的氛围中。陈仪把这项工作看成是“治台的重要工作”。所谓“心理改造”,也就是在光复初期台湾要重点完成的社会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陈仪还专门谈到编译馆的具体任务:

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达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花五年工夫来完成他。<sup>[2]</sup>

其实,陈仪有关编译馆的设想并不是此时才有的。早在1944年他奉命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时,在编制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就已经提到要设立编译机关。根据后来正式公布的文本,其中第八项教育文化的第51条称:“日本占领时印行之书刊、电影片等,其有诋毁本国、本党或曲解历史者,概予销毁。一面专设编译机关,编辑教科参考及必要之书籍图表。”<sup>[3]</sup>

陈仪于1945年10月24日抵达台北,次日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身份主持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陈仪将台湾的接管和重建分为三部分,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心理建设。至1945年底,政治、经济建设已基本成型,因此1946年将工作重点逐步转入思想文化建设。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成立之初,就下设宣传委员会,负责台湾的电影戏剧、新闻广播、图书出版、政令宣传等行政管理工作。1946年,开始设立各种业务机构和文化团体。同年4月2日,正式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由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任主任委员,隶属于行

[1]《陈仪致许寿裳电报》(1946年5月1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陈仪致许寿裳信》(1946年5月13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3]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政长官公署教育处。5月1日陈仪开始与许寿裳联系,8月7日正式成立台湾省编译馆,隶属于行政长官公署。此前的6月16日,还成立了由台北市长游弥坚任理事长的台湾文化协进会,负责联系岛内热心文化的人士和团体,共同协助文化重建和国语推广。从行政隶属关系看,上述这些机构团体,最重要的当属宣传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和编译馆。宣传委员会是行政管理机关,含有“破”的职能,负责清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各种殖民地文化;而“国语推行委员会”和编译馆则侧重于“立”,即从国语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两方面为中华文化在台湾重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陈仪给许寿裳的信可知,他希望编译馆不仅要编印学校教科书、参考书,而且要编印适合公务员和社会大众阅读的各种通俗读物及辞书字典等,甚至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因此,从设立背景和光复后的重建思路来看,编译馆的地位极为重要,是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一环。

## 二、许寿裳有关编译馆的思考与实践

许寿裳是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学术造诣深厚,具有开阔学术视野,与鲁迅是挚友。抗日战争期间,许寿裳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于西北、西南各地,先后在西安临时大学、中山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校任教,渡台前为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战争的痛苦经历,使许寿裳真诚希望抗战结束后能够建设新中国,但战后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却令他失望。因此当与许寿裳有同乡之谊的陈仪邀其赴台时,他即表示同意。据许寿裳女儿许世玮回忆:“父亲所以到台湾,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当时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sup>[1]</sup>

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从上海飞抵台北,且对这块新收复的土地印象很好。许给朋友家人写信多次谈到:“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六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佳”。<sup>[2]</sup>“此间风景优美,秩序亦佳。惟经日人统治五十年,教育虽较普及农工,而国语几濒于消失。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非国内他省所能企及。”<sup>[3]</sup>因此,许是满怀激情而来,希望能为台湾文化重建乃至中国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许寿裳在未抵台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编译馆的工作。陈仪提出编译馆要编印教科书、大众读物和翻译世界名著,许寿裳在此基础上还特别想到要增加台湾研究。他在赴台前就与友人商量,抵台后又多次与朋友交谈,思路逐渐清晰。1946年7月初,许寿裳将草拟的编译馆《组织大纲草案》提交陈仪审阅,其中就提到要设教材组、丛书组、译著组、台湾研究组、南洋研究组等五个组。其中的台湾研究、南洋研究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两个特色学科。陈仪对此并没有反对,只认为丛书组“不必单独成一组”,其余交给行政主管

[1] 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鲁迅研究资料》1984年第14期。

[2] 《许寿裳家信拟稿》(1946年7月),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3] 《许寿裳致陈百年等电函拟稿》(1946年7月),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部门去考虑。<sup>[1]</sup>经过修订后,同年8月2日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公布的《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编列了四个组,即学校教材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编译组、台湾研究组,将丛书组改为社会读物组,南洋研究组取消,台湾研究被正式列入编译馆的工作范围。<sup>[2]</sup>这是许寿裳对编译馆工作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其中包含了他对台湾的认识以及如何在光复初期开展文化重建的思考。

许寿裳认为开展台湾文化重建必须充分发挥本地的文化优势。许在抵台之初给朋友写信时就提到:“访大木之遗微,寻倭政之陈鉴。”<sup>[3]</sup>大木即郑成功,这是要把台湾文化重建与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联系起来。8月10日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说:“陈仪长官拟设一个编译机构,他的志愿是很宏大的。设立台湾省编译馆的要旨不外有两点:‘第一,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第二,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他认为这两者完全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台湾的教育,向称普及,一般同胞大抵至少受过六年或八年的教育,这种情形在各省是少见的。”“台湾的学术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有为各省模范的资格。”台湾同胞由于受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sup>[4]</sup>这些认识,可以说比较全面客观。光复后的台湾开展文化重建,不是简单地强化中华文化,而是要同时发挥台湾的地方文化优势,把台湾建成对全国有示范协进作用的先进省份。

要发挥台湾地方文化优势,关键是如何看待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许寿裳认为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在上述记者会上说:

过去本省在日本统治下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却也不能抹杀其价值,我们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把过去数十年间日本专门学者从事台湾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译和整理,编成一套台湾研究丛书,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sup>[5]</sup>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确实有一大批学者赴台进行研究,留下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这些成果,要经过“翻译和整理”,即经过消化吸收,转化为对治理台湾与继续开展研究有用的资料。

由于许寿裳有这样的思路,他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注重延揽各类人才。为了编辑学校教材和社会通俗读物,他想方设法从大陆延揽各门学科的学者及编辑人才,包括邹谦、李霁野、傅溥、张一清、朱云影、章微颖、谢似颜、周学普等。为开展台湾研究,他特地聘请本地知名学者杨

[1]《陈仪致许寿裳信》(1946年7月4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2]《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27页;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60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03-105页。

[3]《许寿裳致陈百年等电函拟稿》(1946年7月),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4]《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编译馆旨趣与工作的讲话稿》(1946年8月10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5]《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编译馆旨趣与工作的讲话稿》(1946年8月10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云萍出任台湾研究组组长，嘉义的赖子清、彰化的张樑标也先后进入编译馆工作。此外，他还留用了一批即将被遣送回国的日本学者，如语言学家浅井惠伦、考古学家国直分一、民俗学家池田敏雄、昆虫学家素木得一等。由于当时大陆各省交通困难，各地学者赴台大费周章，因此，台湾本地学者和日本学者的加入，再加上原已在教育处从事教材编辑的学者，使编译馆初期的人才汇集工作初见成效。

陈仪认为编译馆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编印中小学教材。“编译馆虽分四组，虽然四组工作都重要，但在明年，尤其在上半年，希望特别注重中小学教科书一类。……此种新教本望于暑假前编竣，俾暑假后可以应用。”<sup>[1]</sup>虽然此时编译馆人员尚未到齐，但许寿裳很快根据陈仪的指示加强了编辑教材的工作，计划在1947年6月至迟年底前完成拟编的中小学、师范、职校等教材达200多册。其他各组也都制订了详细计划。其中台湾研究组在已经开展收集古籍文献的基础上，拟将校点清末《台湾通志》列入“台湾省编译馆丛书”第一种出版（后因印刷问题未果）。又与法商学院合作，编辑出版《台湾经济年鉴》；与台湾大学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拟编译出版“台湾研究丛书”。至1947年初，《台湾经济年鉴》“光复后第一号”正式出刊，《台湾学报》第一期已经付印，“光复文库”开始出版。<sup>[2]</sup>

由此可见，台湾省编译馆成立之初的工作颇有成效，不仅有清晰的计划安排，而且许多项目都已在进行中，有的接近或已经完成。但没过多久，“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省编译馆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

### 三、“二·二八事件”与台湾省编译馆的命运

“二·二八事件”其实与台湾省编译馆无直接关联。《许寿裳日记》记录了事发当时编译馆所受的冲击：

廿八日（星五）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

三月一日（星六）晨六时搭交通车回。子青来。

三日（星一）雨。得海文片，知仰秋昨日归途被击数拳。<sup>[3]</sup>

上引资料提到的“子青”即台湾省嘉义县人赖子清，当时他在编译馆工作，见馆中同仁“困守一夜不敢出”为大家送便当，第二天还到许寿裳宿舍去探望。另一名馆内编纂程璟（仰秋）则在归途中被人打了几拳。3月23日许寿裳写信给许世瑾、许世璿，对编译馆所受冲击有更清楚的描述：

廿八日下午，本馆同人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暴徒声称打中国人，以中国与台湾对称，其悖可推知），待遇有否不公，幸本省同仁告以“公”，

[1]《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概况》（1947年1月18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9-123页。

[2]《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概况》（1947年1月18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9-123页；杨彦杰：《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的台湾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0页。

始一哄而去，如是者三次。是夜困居一宵，翌晨始送同仁各回其它，馆中同仁打伤者二人，皆在路上，公私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并望转告亲友为要。<sup>[1]</sup>

从目前公布的档案、回忆录及口述史等各种资料看，“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主要是陈仪的施政错误，以及台湾民众对行政长官公署体制和接收官员的腐败不满。民众普遍感到生计困难，一些官员却趁机敛财，导致民间的愤怒情绪越积越多，以致被瞬间点燃。台湾省编译馆是个文化机构，馆内同仁相处得很好，没有省籍矛盾，因而这个事件与编译馆原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后没多久，编译馆却遭到裁撤。

5月11日，陈仪因“二·二八事件”下台，返回南京。5月15日，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抵达台北，第二天即召开省务会议，决定撤销台湾省编译馆，其业务交由省教育厅接收。许寿裳在事后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十七日（周六）雨。《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sup>[2]</sup>

许寿裳对台湾省编译馆突然遭裁撤感到不解和愤怒。6月25日，他在抵台一周年之际又写下如下感言：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办馆事，初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sup>[3]</sup>

编译馆为什么要被裁撤？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此机构是出于陈仪的个人构想，它的设立只依据行政长官公署制订的单行法规，在制度上相当脆弱。当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省政府时，编译馆的撤废可能只是行政机构调整的一环而已。<sup>[4]</sup>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事实上，在陈仪将被撤换的消息传来时，许寿裳就有了预感。4月23日、24日，他两次去拜访陈仪，并当面向陈仪递交了辞职报告，但陈“不肯受”。从陈仪的角度看，他似乎认为编译馆应该保留，继续发挥作用。5月5日，台湾大学拟聘许寿裳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派人前来接洽，许寿裳答“俟考虑再说”。5月15日魏道明飞抵台北，台大当天即“送来教授聘书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聘书。”<sup>[5]</sup>可见，从4月下旬至5月中旬这段时间，许寿裳及友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且他们基本判定编译馆最终是要被裁撤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1]《致许世瑾（诗芹）、许世璿（诗荃）》（1947年3月23日），彭小妍、施淑、杨儒宾、北冈正子、黄英哲编校：《许寿裳书简集》（下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年，第1521页。

[2]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6页。

[3]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10页。

[4] 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13-114页。

[5]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5-806页。

有学者认为,编译馆被裁撤的原因并不单纯,可能与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许寿裳经常抵制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的CC派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政策,这使CC派对许颇为不满,在南京时就指令魏道明要处理此事。<sup>[1]</sup>不过,将编译馆的裁撤归因于国民党派系争斗的观点,仍需进一步的佐证。当时还有一种传言,认为编译馆用人太多,浪费公帑。这纯属造谣诽谤,许寿裳当时即予以驳斥。<sup>[2]</sup>从事情发展的前后因果看,编译馆被裁撤显然与陈仪的下台有关,同时也与魏道明的施政理念有直接关系。

#### 四、编译馆之后的台湾文化重建

1947年5月16日,魏道明在抵达台北次日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一通讲话,“谓中华民族自来同化异族,未曾受异族同化,有人诬台省同胞受日本奴化教育之非。”<sup>[3]</sup>这个讲话是针对陈仪的。所谓“受日本奴化教育”在陈仪主政时经常被提及,也引起了激烈争论。“奴化”一词的使用确实很伤害台湾同胞的尊严与感情。魏道明的讲话实际上有借批判“奴化论”进而拉近与台胞思想感情的用意,同时也宣告了魏的施政理念将与陈仪大不相同。

陈仪在台湾强力推行中华文化重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看无可非议。但由于陈的军人作风,缺少与台胞沟通的同理心,又刚愎自用,因此一些做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他在台湾光复刚满一周年之际即下令禁止使用日语日文,致使许多台湾同胞因不懂国语国文而陷入窘境。“奴化”等提法也引起台胞很大反感。王白渊在1946年1月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反映了这种情绪。其中一篇《所谓“奴化”问题》说:

从前在日本统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头痛,光复后还有“奴化”两字不断地威迫着我们。台省现在的指导诸公,开口就说台胞“奴化”,据说政治奴化、经济奴化、文化奴化、语言文字奴化、连姓名亦奴化,好像不说台胞奴化,就不成台省的指导者,似有损失为政者的资格一样。

另一篇《告外省人诸公》又说:

台省本是一个富有秩序的社会,……台省在其各方面,既有具备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诸条件。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为不能当权之口吻,我们以为这是鬼话,除去别有意图,完全不对。……台胞虽受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现象与本质,应该要认识清楚,不可以为一时的现象,例如台胞惯用日文日语,或是带着一点日人脾气,或是不能说漂亮的国语,写流利的国文,就说台胞奴化变质或是没有用。……台胞虽是在日本高压之下,但竟受过高度

[1] 李何林:《李何林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2]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8页。

[3] 林献堂著、许雪姬主编:《灌园先生日记》(十九),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第289页。

资本主义的洗礼,很少有封建的遗毒,在这一点我们以为台胞可以自慰。<sup>[1]</sup>

王白渊的上述言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台湾的社会情绪。这些情绪与文化重建相纠葛,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当时台湾光复不到三个月,但省籍矛盾已非常突出,“外省人”“外省人诸公”“指导诸公”等词汇俯拾皆是。第二,在这种省籍对立情绪的刺激下,文章更侧重对台胞、台湾文化的辩护,除了强调99%的台胞“绝对没有奴化”外,更强调台湾虽然遭受日本高压统治,“但竟受过高度资本主义的洗礼,很少有封建的遗毒”,“具备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诸条件”,比大陆还要先进。第三,台胞要求平等待遇。“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不这样说就不能成为“台省的指导者”,“似有损失为政者的资格一样”,其实是发泄对政治压迫的不满。平心而论,这些言论放在当时省籍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很容易理解,台湾同胞要求参政的民主权利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从发表议论的立场看,在省籍矛盾刺激下,某些言论明显带有偏激的倾向,强调台湾本地特点,对于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必要性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等问题缺乏全面而冷静的思考。

如前文所述,许寿裳在创建编译馆时就已反复强调要发挥台湾的文化优势,认为台湾有很多方面比大陆先进,完全可以成为各省模范。同时许强调,由于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sup>[2]</sup>“日本本位的”这几个字特别重要,揭示了日本殖民教育的本质。这是光复以后在台湾开展文化重建的背景,也是编译馆设立的重要原因。加强国语国文和史地教育,目的就是要消除过去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增强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许寿裳在反思事件中的过激行为的原因时,提到日本五十年侵略教育的遗毒是远因。他在一封信中更强调此后加强教育的重要性,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补救之功,倍形艰巨。本馆同仁职司编译,亦惟有尽其在我而已。”<sup>[3]</sup>

魏道明抵达台北后不久,就发表了批“奴化论”的讲话,同时裁撤编译馆。可见编译馆被裁撤的根本因素是魏道明的施政理念不同。

陈仪主政时强力推行文化重建工作,为此设立了多个机构和团体,并有一套完整的构想。魏道明抵台后,鉴于当时省籍矛盾激化,社会不满但又一片沉寂,因此将施政重点放在安抚民心方面。他较注意选拔台湾人参政,在此基础上悄无声息地进行文化建设。“国语教育运动”继续推行,“二·二八事件”时被陈仪撤销的宣传委员会又得到恢复,以台湾文人为主体的台湾文化协进会继续开展工作,但编译馆被撤销,教材编写工作改为教育厅负责。原来设想的编

[1] 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10页。

[2] 《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编译馆旨趣与工作的讲话稿》(1946年8月10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3] 《致朱文叔》(1947年3月26日),彭小妍、施淑、杨儒宾、北冈正子、黄英哲编校:《许寿裳书简集》(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年,第927页。另:当时,台湾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加强教育的重要性。1947年3月18日,林献堂在白崇禧召开的招待茶会上谈对“二·二八事件”起因的看法时,特别讲了要加强教育,尤其是对青年的教育。“台湾受日本之压迫、同化教育,青年多变成急性量浅,不能认识国家,故有此举,此后对于教育须当努力,以造成之真正国民,不可有互相仇恨之心。”陈仪当时也在场,随后发表讲演,同样强调“教育之必要”。参见林献堂著、许雪姬主编:《灌园先生日记》(十九),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第170页。



印大量通俗读物和编译外国名著等计划戛然而止，台湾研究亦陷于停顿，直至1948年6月才另立台湾省通志馆，由台湾知名人士林献堂任馆长。台湾省通志馆的设立其实也是为了安排本地文人，起安抚人心的作用。林献堂身体不太好，又家住雾峰，每次到台北必定要到通志馆开会，以推动工作。省政府并没有在资金、用房等方面给予太多支持，人才延揽也不易，因此工作很难开展。

由此可见，魏道明主政以后，工作重心转移，台湾的文化重建已不是重点。虽然台湾省的国语教育仍在进行，并创办了台湾省通志馆，但总体力度并不大，促进台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等方面没有太多举措。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49年。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总体看并不彻底。

## 结 语

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重回祖国的故土，开展中华文化的重建完全必要。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殖民地回归以后的文化重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持续不断的努力。陈仪的设想需要三五年时间，但只进行一年多就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所有的设想都被打乱。

其二，文化重建最根本的任务是社会思想建设，这需要对整个社会心态有完整准确的把握。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光复以后满怀激情和希望，但很快就出现了省籍矛盾。政策失误和官员腐败是最根本因素。陈仪事前既不能准确把握台胞的普遍心态，事中又不能及时沟通调整，对官员的腐败也无力约束，也难以推行文化重建。

其三，魏道明就任省政府主席后，立即将编译馆撤销，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旧的行政体制可以改变，但正确的理念则需要坚持。台湾省编译馆担负着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具有社会教育的责任。但魏道明的施政理念不在于此，除了继续推广国语教育、开展学校教育、创办通志馆、鼓励文人活动之外，已经没有什么重大文化举措。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就这样在维持社会稳定与局势瞬息变化的交织中陷入沉寂。

总体看，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并不彻底，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未被彻底清除，省籍矛盾依然存在，民族文化认同的目标也很难说完全达到。这些因素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或隐或现，经常作为潜在因素与各种事件相结合显露出来。因此，研究当代台湾史不能不关注光复初期的这段历史，文化重建及其成败即是其中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 张 华）

#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aiwan'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Early Post-Retrocession Period: The Case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Yang Yanjie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retrocession period is a subject worthy of scholarly inquiry.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from 1945 to 1949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marked by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Chen Yi vigorously promote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with many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Institute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lans formulated. After Wei Daoming took office, however, a shift in governance philosophy led to a marked decline in the intensity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stitute was subsequently abolished. Overall,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post-retrocession period was far from thorough: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as not completely eliminated, tensions between people hailing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persisted,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was to be reinforced over time. These factors exerted potential an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aiwan.

**Key Words:** Early Post-Retrocession Period of Taiwan;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iwan Institute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